

Spread of Buddhōṣṇīsavijayadhārānī Pillars of Tang Dynasty in Shanxi

唐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在山西的流布

文 / 赵改萍 Zhao Gai-ping

摘要: 在唐代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非常盛行的背景下,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及经幢流行于全国各地。因此,山西亦出现数量可观的佛顶尊胜经幢。这些经幢的产生不仅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照,且与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中宣扬的宗教功能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关键词: 唐代; 山西;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

中图分类号: B945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5 - 9625 (2012) 02 - 0041-06

山西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,至今留存有众多的佛教文化遗迹。唐代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便是其中的一部分。本文对唐代山西佛顶尊胜经幢的分布进行统计的基础上,重点分析了陀罗尼经幢在山西流布的原因,不当之处,敬请方家指正。

一、唐代山西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的流布

幢这一佛教圣物与密教联系最为密切。大唐中印三藏善无畏译《苏悉地羯罗供养法》曰:“次运心供养者,以心运想,水陆诸花,无主所摄,遍满虚空尽十方界,及与人天妙涂香云。烧香灯明幢幡伞盖,种种鼓乐歌舞妓唱,真珠罗网悬诸宝铃,花鬘白拂微妙磬铎,矜羯尼网如意宝树,衣服之云。”^[1]可见,“幢”是佛教中供养物之一,用来庄严圣地。大唐中天竺三藏输波迦罗译《苏悉地羯罗经·成就诸物相品

第二十七》曰:“复次我今说成就物。依是三部真言悉地。所谓真陀摩尼、宝瓶、雨宝、伏藏、轮、雌黄、刀,此等七物。……言七物者……若欲成就贤瓶法者,庄严其瓶,如受真言品中说,唯不着水置于幢台,次作瓶样,样准印法……”。^[2]可见,幢是佛教修行中必备物品之一。

在藏传佛教里,胜尊幢用来代表解脱烦恼、得到觉悟的象征。藏传佛教更认为幢是戒、定、慧、解脱、大悲、缘起和脱离偏见之象征,所谓有 11 种烦恼只有胜尊幢才能降伏。不难看出,胜利和清净是汉藏佛教有关“幢”的共同主题。

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译出后,因经中要求书写此陀罗尼,并“安高幢上,或安高山或安楼上,乃至安置窣堵波中。”故而唐人采取将此经镌在石幢上的方式,而创作了石经幢。

唐代,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在山西的流布范围很

广,几乎遍及全省。在此,笔者根据《山右石刻丛编》、《山西通志》、《三晋石刻大全》、《石刻资料新编》以及山西各地地方志、碑刻和近年来的考古发掘等资料,对山西各地的陀罗尼经幢进行粗略的统计。列表如下:

名称	时间	形制、结构	出处
为□敬造佛顶陀罗尼幢合村供养	永淳元年(682)	经幢为沙石质,通体为八棱石柱,近六尺。上部阳面首题“为□敬造佛顶陀罗尼幢合村供养”,下部八面为幢文,各面九行,满行五十五字。	《三晋石刻大全·临汾市安泽县卷》
尊胜陀罗尼经幢	永淳二年(683)	山阴县西北二十五里礼风村上清观,高可二尺许,每面三行,行二十五字。	《石刻资料新编》第2辑《河朔访古新录》
寿阳县平舒村崇福寺经幢	神功元年(697)	幢八面,高二尺八寸,每面广六寸,九行,行五十五字至六十三字不等。	《山右石刻丛编》卷5
介休雨水村吉祥寺经幢	开元二十年(732)	幢八面,高四尺二寸,每面广六寸二分,八行,漫漶过甚,字数难稽,正书。	《山右石刻丛编》卷6
陀罗尼经幢	开元二十年(732)	山阴县北三里梧桐堂佛殿前,高可九尺,额篆书九字,“佛顶尊及尼宝幢”六字可辨。	《石刻资料新编》第2辑《河朔访古新录》
周元汉陀罗尼经幢	开元二十八年(740)	山阴县西北三十二里临泉村结义庙,八面刻,无额,末面附题记。	《石刻资料新编》第2辑《河朔访古新录》
临猗唐开元经幢	开元年间(712-741)	幢身一面镌刻题额及愿文,其余七面镌刻《佛说尊胜陀罗尼咒》及其序,并多处以小字标注和提示了经咒的音调。经咒以汉字楷书竖行镌刻,每面四行,每行约十七字,字体精劲秀丽,清晰可观。	中国玉器收藏网 http://www.artcn.com/article.asp?id=5113
唐风台县石幢	天宝元年(742)	幢身镌刻《佛说尊胜陀罗尼经》及序	《石刻资料新编》第3辑《风台县金石录》
潞城原起寺经幢	天宝六载(747)	幢座由两层组成,底层方形,上层为八角形,上下两层均雕伎乐人,风姿飘逸,造型生动;幢身为八棱形,上刻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;幢顶为仿木结构的攒尖顶。	中华五千年网 http://www.zh5000.com/ZHJD/zmjc/2006/zmcj-0050.htm
风台县杨口仙造陀罗尼经幢	天宝十二载(753)	幢高二尺五寸,广四尺六寸,八面刻。先经后记,六行,行字不一,字径六分,正书。	《山右石刻丛编》卷6
尊胜幢	天宝十二载(753)	山阴县西三十四里崔沟村,行六字,多不可辨。	《石刻资料新编》第2辑《河朔访古新录》
闻喜县王守忠经幢	永泰元年(765)	幢高一尺三寸七分,七面,各面三寸八分。七行,行三十一字至二十九字不等,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。	《闻喜县志》民国七年版,台北成文出版社。
交城天宁寺经幢	贞元、元和年间(785—820)	现存经幢六座,有方形和六角形两种。其中一座设须弥座,上置仰莲座,幢身二层,下层正面雕方形门,门外刻拱形门楣,两侧各雕金刚一尊;二层塔身刻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,之上为幢顶,由云墩、仰莲、宝珠和宝顶组成。	李彦、张映莹:《〈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〉及经幢》,《文物世界》2007年第5期。
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	太和五年(831)	山阴县西三十里衡涧村兴国寺,高九尺,三重规制。三面刻佛画,六面书经文,二面为幢赞问。	《石刻资料新编》第2辑《河朔访古新录》
泽州刺史皇甫曙造金刚经幢	开成元年(836)	幢高五尺三寸,八面,面广六寸五分,行字不等,正书。	《山右石刻丛编》卷9
风台县王刘赵珍等造陀罗尼经幢	开成四年(839)	幢高三尺四寸五分,八面,面广六寸五分,经七面,记一面。两截刻,七行,行字不一,正书。	《山右石刻丛编》卷9
平陆陀罗尼经幢	开成四年(839)	八棱柱体,顶已佚,高四尺一寸,底座长方形。正楷,上书陀罗尼经文。经幢稍微损伤。	平陆县志编委会:《平陆县志》中国地图出版社,1992年。
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	会昌四年(844)	山阴县西七十里西窑村,高三尺,未甚损坏。一面题记。	《石刻资料新编》第2辑《河朔访古新录》

五台山佛光寺经幢	大中十一年(857)	高九尺七寸，幢设八角形基座，仅有上枭和束腰，每面镌刻壶门，狮子卷伏其中。基座上是仰覆莲的狮子座，之上立八角形幢身，上刻《陀罗尼咒》。幢身上设八角形宝盖，每面悬璎珞一束。宝盖之上设八角矮柱，四正面各雕佛龕一尊，中置佛像，最上为莲瓣及宝珠。	梁思成：《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》，《文物参考资料》1953年第5、6期。
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	大中十三年(859)	山阴县城内学乡贤祠，正书经文。	《石刻资料新编》第2辑《河朔访古新录》
五台山佛光寺经幢	乾符四年(877)	高十四尺七寸，经幢设八角形须弥座，束腰部分每面设龕，内有伎乐。幢身平面亦为八角形，上刻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，幢身上为八角攒尖顶形的屋盖。	梁思成：《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》，《文物参考资料》1953年第5、6期。
汾阳北廓村经幢	乾符四年(877)	高九尺六寸，经幢平面为八角形。幢座由八角形基座上托圆形束腰莲花须弥座构成，基座八角有石雕力士支撑。幢身为八棱直柱，幢顶由八角攒尖上嵌莲花宝刹构成。幢身上段八面各有线刻佛像一尊，下段为经幢主体，七面阴刻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经咒全文七十六句，一面为题记。	山西省汾阳县志编纂委员会：《汾阳县志》，海潮出版社，1998年。
风台县广福寺经幢	天复三年(903)	幢高四尺八寸，八面，面广五寸，记二行，行字不一，字径五分，正书，额题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幢。	《山右石刻丛编》卷九
闻喜县唐陀罗尼幢	具体时间不详	长方形，高近七寸，上开两佛龕，左龕内1尊释迦佛跏趺坐。右龕内1站立护法天尊。两龕之间楷书为“唐兴寺庄司马伯達陀罗尼幢”，保存完整。	山西省闻喜县志编纂委员会：《闻喜县志》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3年。
虞乡县石佛寺经幢	唐末，具体时间不详	幢高四尺，八面，每面广五寸。七行，行六十七字至八十七字不等，正书。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序和经文。	《山右石刻丛编》卷六
洪洞县广济寺经幢	唐代，具体时间不详	它由青石砌成，平面呈八角形，四层十五级，高二十八尺二寸。	祁英涛等：《两年来山西新发现的古建筑》，《文物参考资料》1954年第11期。
晋城崇寿寺经幢	唐代，具体时间不详	寺内有唐代八角形石幢两座，通高十二尺米，须弥座上雕宝装莲瓣及石狮，幢身刻陀罗尼经，宝盖为缨珞花纹，镂刻精细。	古代建筑整修所：《晋东南潞安、平顺、高平和晋城四县的古建筑（续）》，《文物参考资料》1958年第4期。
五台山广济寺唐代经幢	唐代，具体时间不详	经幢呈八角形，通高四米，下施扁平的须弥座，并各面雕狮。幢身八面，俱有造像，刀法简洁古朴。经幢铭文已漫漶不清，书法近似唐体，遒劲有力。幢身之上覆以宝盖，周围浅雕几何形图案，且绕以缨络。宝盖以上施覆钵和宝珠，镌刻莲瓣。	五台山广济寺
卫褚经幢	唐代，具体时间不详	高七尺米，最下为方形叠涩衬石，上承以仰覆莲座，束腰部分有八个兽首。莲座上又置八角形塔，每面刻有连续菱纹、回纹及三角纹。幢身为平面八面形，上刻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及立幢人姓名。幢身之上有一八角方墩，周围刻有花草图案，上面置第二层幢身，一面刻“佛说尊胜陀罗尼经咒”，其余三面刻人物画像。	《三晋石刻大全·运城市盐湖区卷》
张董经幢	唐代，具体时间不详	通高2.11米。经幢两层，幢身棱形，上刻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及发愿人姓名。	《三晋石刻大全·运城市盐湖区卷》
唐繁峙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	唐代，具体时间不详	经幢八面刻，上截字多漫灭。经咒之前有序，经文后字四行，刻有姓名。	《石刻资料新编》第3辑《繁峙金石录》
忻州兴国寺唐代经幢	唐代，具体时间不详	八棱石柱形，高五尺四寸。幢上刻着《尊胜陀罗尼经》，笔体遒劲，因年代久远，刻幢年月与人名已漫漶不清。还有两个八角石盖，一个上下面的中间都有八角幢础部分，形状为楼亭的石檐造型，下面有精细的石雕，雕刻图案为飞天、金雕和牡丹，八个角上刻着悬挂风铃的双孔。另一个下面中间的八角幢础四周刻有覆莲瓣，侧面四周刻着帷幕的缨络。	佛教导航网 http://www.fjdh.com/10/0802321742.html

依据上表看，唐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在唐高宗、武则天、唐玄宗、唐代宗、唐德宗、唐文宗、唐宣宗、唐僖宗与唐昭宗各有所建，并主要集中在唐中晚期。其中，现存最早的陀罗尼经幢是唐永淳元年（682）“为□敬造佛顶陀罗尼幢合村供养经幢”，存于安泽县博物馆。

在地域上，晋南、晋北、晋中都不均匀的分布着陀罗尼经幢，但以晋南与晋北地区偏多。晋南地区的晋城、闻喜、永济均有分布，以晋城为最多，闻喜次之；晋北地区主要集中在五台山周围的地区。这样事实上在山西形成了两头多、中间少的分布特征。五台山自佛教传入以来，就得到历代皇帝的支持与扶植，唐代五台山又受到密教的推崇，陀罗尼经幢的建立便顺理成章。晋南一带靠近陕西，晋东南的泽州、沁州则靠近河南，受两地密教风气盛行之影响而使然。

就经幢内容而言，多刻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。其中以携带此经梵本来华的罽宾僧人佛陀波利之译本最为流行。此外，在上述经幢中还刻有《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》的内容。

就经幢高度来看，经幢的高度介于0.23米至9.4米之间，其中2米以下者占总数的58%，2—4米者占总数的33%，4米以上者占总数9%。这与全国分布着的陀罗尼经幢的高度基本一致。不过，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陀罗尼经幢中，1米以下者却占到了总数的25%。究其原因，除与经幢发展历程相关外，可能和山西特殊的地理环境、经济条件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等因素有关。山西地处黄土高原，降雨量少，多山且交通不便，土地贫瘠，植被较差，自然灾害频繁，经济较为落后。在这样特殊的地理环境下，人们养成了节俭的生活习惯。正如史籍所载：“地瘠则民劳而贫，自三帝三王以来，勤俭之俗未尝改过”，“河东地瘠民贫，风俗勤俭。”^[3]这种节俭的生活风俗，加之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，影响着人们建幢时对高度的选择。

二、唐代山西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流行的原因

密教传入中国后，僧人不断传译行持佛顶法，于是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以及陀罗尼经幢在全国各地

流行。关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在山西的流布，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：

第一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的兴建与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这部佛经具有除灾和成佛等功能密切相关。该经宣扬可永离病苦、延年益寿。如地婆诃罗译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云：“吾为汝等及诸众生，说彼修行陀罗尼法。若有命短求长寿者，或有病苦求除愈者、或有恶业应堕地狱饿鬼畜生诸不善趣如是等类。皆当以彼月十五日，洗浴清净著新洁衣。又当受持八戒斋法，然后诵此大陀罗尼满足千遍，当获安乐增其寿命，所有病苦皆得除愈，诸恶业报悉灭无余。”^[4]正因如此，该经被现实中的人们所吸引和喜好。

该经又宣扬可免除因业障恶因所招致地狱、畜生、饿鬼等恶道的果报，尽此生后可往生诸佛国土。如佛陀波利译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云：“天帝，若人能须臾读诵此陀罗尼者，此人所有一切地狱畜生阎王界饿鬼之苦，破坏消灭无有遗余。诸佛刹土及诸天官，一切菩萨所住之门，无有障碍，随意趣入。……天帝，若人须臾得闻此陀罗尼，千劫已来积造恶业重障，应受种种流转生死，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、阎罗王界、阿修罗身，夜叉、罗刹鬼神、布单那羯吒、布单那阿波娑摩啰，蚊、虻、龟、狗、蟒蛇，一切诸鸟，及诸猛兽一切蠢动含灵，乃至蚊子之身，更不重受。”^[5]可见，该经特别强调“尊胜陀罗尼”的破地狱功能。由于此经的破地狱功能，“尊胜陀罗尼”自然大受欢迎。鉴于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中宣扬持诵“陀罗尼”之神力，因而，经幢的建立，更成为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的另一重要活动。

第二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的兴建也得益于陀罗尼之法的简单方便。唐杜行顼译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中曰：“若有命短求长寿者，当于白月十五日澡浴清净，著净洁衣受八戒斋，诵此陀罗尼千遍。诸障便除病愈寿增获大安乐，地狱畜生诸恶趣苦咸悉解脱，乃至畜生诸恶趣类，耳得闻此陀罗尼者，便复不受恶趣之身。婴缠重病者病皆消散诸趣清净，命终之后生现乐界，莲华化生不受胎藏常知宿命。若诸众生罪业所牵，命终之后生于恶趣，应以此陀罗尼呪土二十一遍，散其骸骨之上随其所生若地狱若畜生，或阎摩卢迦或

饿鬼趣，乃至阿鼻地狱禽兽昆虫，咸谢苦身生天受乐。日日诵此陀罗尼二十一遍，罪灭福增众人爱敬，命终之后生极乐国。若常念持此陀罗尼，命终之后生诸净土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一切佛刹作大光照。常与佛俱诸佛护育而与授记，乃至获证大涅槃乐。”^[6]此外，经文中还提及：凡人接近或见到此陀罗尼，甚至只要书写着此陀罗尼的经幢的影子映到身上，乃至于幢上的灰尘偶然飘落人身上，则此人亦得以净除一切罪业恶道。很多经幢上的铭记都提及这一点，如唐文宗开成四年（839），山西晋城凤台县王刘赵珍等所建立的陀罗尼石幢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赞文并序》云：“天帝传时教敷扬于沙界，层幢回声沾泽者销殃，石塔岩峣口尘者灭罪则有择口。”^[7]这也是促使唐人建立经幢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第三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的兴建与五台山文殊信仰有着直接的关系。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形成除唐朝历代帝王对五台山佛教的扶持外，也与密宗对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大加弘扬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如《宋高僧传》载，不空于大历四年（769）“奏天下食堂中置文殊菩萨为上座，制许之。”第二年，又“有诏请空往五台山修功德”，后来不空又“进表请造文殊阁，敕允奏。”^[8]佛陀波利的传奇正发生在五台山信仰的兴盛时期，成为五台山文殊信仰的灵迹之一，为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披上了神异的色彩。如在今山西永济虞乡的石佛寺经幢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》即云：“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者，婆罗沙门僧佛陀波利，仪凤元年（676）从西国来，至此土到五台山。次遂五体投地地向山顶礼曰：‘如来灭后，众圣灵唯有大士文殊师利于此中汲引苍生教诸菩萨。波利所恨生降人坚，不睹圣容，远陟流沙，故来敬谒。伏念大慈大悲普覆令建尊仪。’……回还西国取佛顶尊胜陀罗尼经，至永淳二年（683）回至西京，具以上事闻奏。大帝遂将其本入内，请日照三藏法师及敕司宾客令杜行顓共译此经。……此经救拔幽显，最不可思议。恐学者不知故，具录委曲以传未悟。”^[9]于是，借着五台山文殊信仰，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以及陀罗尼经幢得以广泛传播流行，反过来，它们对五台山文殊信仰的普及和兴盛也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。

第四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的兴建与山西独特的

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就地理位置而言，山西与陕西西安、河南洛阳的交通较为便利，这有利于佛教的交流与经幢文化的传播。山西蒲津关地当关内、河东、河南之交会处，地理位置极为重要，据日僧圆仁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载，他在大和二年由五台入长安，“（八月）十三日……从北舜西门出，侧有蒲津关，到关得勘入，便渡黄河”。^[10]可见，通过蒲津关可沟通山西与西安、洛阳的文化交流。另外，关于河东与长安之交通，严耕望《唐代交通图考》第一卷《长安太原驿道》、第五卷《晋绛与潞泽间之乌岭道》，王文楚《唐代太原至长安驿路考》、《唐代太原至长安驿路再考》已作详密之证，可作参考。这样，交通便利受到周边影响，对陀罗尼经幢在山西的流行起了推助作用。

就唐代山西的人文环境看，当时佛教之风盛行。唐五代笔记小说中关于山西人信奉佛教的记载十分普遍，如《太平广记》卷111《报应十·观音经·王琦》载：“唐王琦，太原人也，居荥阳，自童孺不茹荤血。大历初，为衢州司户，性好常持诵观音经。自少及长，数患重病，其于念诵，无不差愈。”^[11]又《太平广记》卷105《报应四·金刚经·杜思讷》载：“唐潞州铜鞮县杜思讷，以持金刚经力，疾病得愈。每至持经之日，必睹神光。”类似这样的故事很多，这里不一一列举，它们反映出唐代山西的佛教氛围非常浓厚。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为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及经幢的流行营造了良好的土壤和根基。

就唐代山西社会的现实看，灾害频繁、赋役深重，使得百姓生活困苦，这为尊胜陀罗尼信仰及经幢的建立提供了基础。据《新唐书》记载，唐太宗二十三年（649），“八月癸酉朔，河东地震，晋州（今山西临汾）尤甚，压杀五十余人，乙亥，又震，十一月乙丑，又震”，景云三年（712），“正月甲戌，并、汾、绛三州地震，坏庐舍，压死百余人”，贞元九年（793），“四月辛酉，又震，有声如雷，河中、关辅尤甚，坏城壁庐舍，地裂水涌”^[12]。这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，加之赋役深重，致民不聊生，使人们很容易受到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拔除地狱等功能的吸引，有些甚至着手建立经幢。我们从造幢者的愿望看，这些经幢都返照着当时

